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沿习之路 国家极点寻访 看山河壮阔 珠发展诗篇 2019

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声音

郑报全媒体记者 安学军 王军方 翟宝宽 马健 夏普 张祎 程红森 陈君平 文/图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潮澎湃而起。

粤港澳大湾区指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等9市组成的城市群。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未来这里将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优质生活圈,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沿习之路”采访车队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

一桥越沧海:港珠澳大桥为大湾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7月盛夏,南海之滨,清风徐来。7月9日,“沿习之路 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南线采访团队来到海滨城市珠海。

上午9时,由四辆越野车组成的采访团队登上港珠澳大桥。波澜壮阔的景象让现场每个人都在为这一伟大工程发声赞叹。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珠海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大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公里,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工程。

“当我第一次参观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心情非常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说起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港珠澳大桥的魅力,24岁的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民警唐耀坤依然激动。

去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唐耀坤通过国考进入厦门边检总站工作,按照计划,他要在珠海进行两个月的岗前培训。“我跟大桥很有缘,原本两个月培训结束我就要回到厦门总站,但是正好赶上港珠澳大桥开通,人手紧缺,我就被派到大桥这边支援工作,我觉得非常荣幸。”

23岁的姜萌跟唐耀坤是同一批进入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民警。“节假日,我们的工作会更忙。”2019年元旦是姜萌执勤,节假日还要上班的她,那天却觉得心里暖暖的。“新年第一天该我上班。临近中午时候,从澳门过来几个少年要去珠海,我给他们办完手续后,他们不约而同微笑着跟我说了一句‘新年快乐’,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让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读大三的香港女孩杜小倩感到非常方便。“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寒暑假结束我可以直接从香港回来珠海上学,能节省不少时间。”杜小倩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如火如荼,我觉得也会影响我未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

初心不能忘:横琴新区助推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

港珠澳大桥往南约30公里,就是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陆桥相连的地方,曾被誉为珠三角核心地区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2011年3月6日,《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其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第一个落地项目,于2011年4月正式落地横琴,由澳门和横琴共同组建公司进行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

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横琴新区考察了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他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

“产业园区在助力澳门企业全方面发展的同时助力澳门的人才快速成长,促进澳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带动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的媒体副经理郑子秋说。

为推动粤港澳三地青年人才的交流,让更多的港澳大学生融入大湾区建设,从去年开始,横琴新区每年都会举办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

“我的很多同学非常希望能来横琴实习,但是学校里只给了20个名额,当知道我被选中的时候,真的超开心。”22岁的邝文秀是澳门理工大学大三的学生,现在被分配到横琴新区管委会的澳门事务局实习。“我是蛮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在横琴工作,希望到时候可以把房子买到横琴。”邝文秀微笑着说。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热潮也吸引了众多港澳青年来到内地发展。“我已经把公司的业务重心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也算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香港商人赖家智目前在广州经营着一家教育咨询公司。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核心是创新:实体经济发展对大湾区建设至关重要

除了促进粤、港、澳多元产业和青年人才的交融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格力电器公司考察时强调,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靠自主创新争取,希望所有企业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格力每年都会设有科技进步奖,每个团队的科研经费都是不设上限的,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格力90后科研人员王亚东介绍着格力内部鼓励创新的举措,他是去年与总书记亲切交流的青年员工之一。

王亚东是山西太原人,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格力工作,现在是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自动化工程师。他所在的团队由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了现在40多人,80后90后的青年人占了团队的绝大多数,并且完全是通过自身培养成长起来的。他们自主研发建立的自动线,将加工的设备、机器人、机器人导轨串联起来,过去4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实现了模具生产线自动化,在行业里具有先进性。

“团队刚成立那段时间,我都不敢与人握手,因为手上甚至指甲盖里全是调试机器时蹭的灰,但我也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的经历,因为这个过程锻炼刻苦攻坚的毅力,奠定了我们勇攀高峰的基石。”王亚东说。

说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王亚东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大湾区对我们是一个机遇,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00后,更应该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勇于站在潮头奉献自己的力量。”

全程技术支持 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5G
特别支持 一汽奔腾 BESTUN 海马汽车 雪佛兰 CHEVROLET
JETOUR 捷途 中国人寿 CHINA LIFE 中国人寿 CHINA LIFE 财产保险

全国夏粮生产获得丰收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数据,2019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174万吨(2835亿斤),比2018年增加293万吨(58.6亿斤),增长2.1%。

其中,夏收谷物产量13248万吨(2650亿斤),比2018年增加261万吨(52.2亿斤),增长2%;小麦产量13106万吨(2621亿斤),比2018年增加267万吨(53.3亿斤),增长2.1%。2019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得益于单产恢复性增长,夏粮产量增加。

统计显示,2019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354千公顷(39531万亩),比2018年减少349千公顷(523.3万亩),下降1.3%。2019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5378公斤/公顷(359公斤/亩),比2018年增加180公斤/公顷(12公斤/亩),增长3.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说,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适当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主动增加优质高效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此外,夏粮单产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条件总体有利,灾情相对较轻。

长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沿江各地须做好洪水防御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13日从水利部了解到,13日5时,长江中游干流九江站水位20.00米,达到警戒水位(20.00米),标志着长江2019年第1号洪水在中下游形成。

受近期强降雨及洞庭湖、鄱阳湖来水影响,长江中游干流九江江段、鄱阳湖发生超警洪水,13日5时,长江中游干流九江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0.00米,10时涨至20.06米。

鉴于长江干流城陵矶段可能超警,应湖南省请求,统筹考虑上下游防洪形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三峡水库从7月12日起逐渐减小水库流量,减轻洞庭湖区和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压力。

7月12日,水利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直辖市)水利部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出通知,对监测预报预警、堤防巡查防守、水工程科学调度、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增派2个工作组分赴安徽、浙江协助指导。此前,水利部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分赴湖南、江西协助指导洪水防御工作。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于近期择机离轨再入大气层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李国利 邓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日透露,根据计划安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完成全部拓展试验,计划于北京时间2019年7月19日择机受控离轨并再入大气层,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西经160度~90度、南纬30度~45度)。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在天宫一号备份目标飞行器基础上改进研制而成,由实验舱和资源舱组成,总长10.4米,舱体最大直径3.35米,太阳帆板展开后翼展宽度约18.4米,起飞重量约8.6吨,具有与神舟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重要功能。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于2016年9月15日发射入轨,设计在轨寿命2年,截至目前,已在轨飞行超过1000天,平台及载荷功能正常、状态良好,受控再入大气层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预定计划扎实稳步推进。天宫二号再入大气层后,我国将及时对外发布信息、通报有关情况,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

北京检查整改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李嘉瑞)记者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将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纳入“2019年群众关注物业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专项治理,全面检查整改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日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物业企业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集中开展高空坠物隐患排查整改和宣传指引工作。具体包括:全面检查整改建筑外墙装饰和玻璃幕墙破损、外立面墙砖空鼓、户外广告牌(牌匾)锈蚀松动、建筑物悬挂物和搁置物松动等;排查整改业主凉台杂物堆积、空调护栏或支架松动、空调室外机堆放杂物等;排查整改企业内部高空作业制度缺失、监控设备运行不正常和高空坠物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

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个生命……

工人日报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董君亚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医生冯秀岭的术前准备工作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要复杂一些。

一副手套,再加一副手套;一层布制分体洗手衣,加一层布制手术衣,再加一层不透气的一次性防护衣;此外,他还要戴脚套、穿胶鞋,头罩有双层防护面屏的头盔。每次装备完毕后,冯秀岭看起来就像一只灵活的企鹅。

之所以要穿戴得如此密不透风,是因为冯秀岭的手术对象很特殊——他们都是艾滋病患者。在这些患者的体内切割、缝针,相当于不断地与携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擦肩而过。

17年间,这样的擦身,冯秀岭经历了3000多次。即使全副武装,他也不可避免地在手术中遇到职业暴露,并为此承受近1个月的身心煎熬。

据国家卫健委估计,截至2018年,我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人。因为遭受意外或生病等原因,这一群体也需要急诊处理或外科手术治疗。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医院都以风险过高为由拒绝为艾滋病人做手术。

一边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一边是医护人员面临的感染风险。这场伦理间的博弈,从冯秀岭第一次为艾滋病人动刀起,就没有停止过。

“那是一条人命”

2002年,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来了一位因输血感染HIV的女病人。当时,她身患直肠癌晚期,并伴有低位肠梗阻。由于病灶堵塞无法排气,入院时这位病人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且疼痛难忍。在普外科,这算不上困难的手术。但因为身患艾滋病,病人已被多家医院拒收,病情一再拖延加重。

当时,手术排班正好轮到了冯秀岭。“当然想要拒绝。”冯秀岭说,那个时候,国内对艾滋病了解还比较少,甚至连预防感染的阻断药都很罕见。如果他选择不做这台手术,同事们都能理解。

可走到病床前,冯秀岭就是没办法把拒绝的话说出口。面对病人的痛苦挣扎,冯秀岭动摇了,“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条人命。”

最终,在只有单层面屏保护头部、脸部的简陋防护条件下,冯秀岭完成了手术,帮患者解除了肠梗阻的痛苦。他记得,手术过程中,行医已十多年的自己第一次紧张到“肢体不协调,用起手术刀来都不自然”。

就像是开了个收不住的口子,那一次后,不断有艾滋病人来找冯秀岭做手术。其中有些人还是从甘肃、陕西、福建、新疆等地远道而来。他们有的是经病友或当地医生介绍,有的是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相似的是,这些病人往往是辗转多地求医无门,把冯秀岭和河南省传染病医院视为最后的希望。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以成都为例,直到2006年,全年艾滋病人手术案例还只有1例。作为国内最早接收艾滋病患者的医院,30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接收了大量被普通综合性医院拒诊的病人,遍及妇产、骨科、神经内科等科室。

现在,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接收的艾滋病人的比例约占所有患者的二分之一,冯秀岭累计已为3000余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职业暴露不可避免

每多做一台手术,就多增加一分被感染的风险。冯秀岭和他的同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在给艾滋病人手术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器械的传递也有别于普通手术。“如果是医护人员之间手手相传,就可能出现划伤。”在冯秀岭的手术台上,器械先由助手放入托盘,他再自己伸手去拿。“减慢手术速度,安全指数才能增加。”

尽管如此,2004年冯秀岭还是遭遇了第一次职业暴露。在给一名艾滋病患者做输尿管结石手术时,手术刀穿透手套划伤了冯秀岭的手。经过紧急处理后,他面不改色地接着完成了手术。

“保持淡定是职业需要,其实我心里非常恐慌。”冯秀岭回忆,手术后,他连吃了一个多月的阻断药物。由于药物作用,期间他常常上吐下泻犯恶心,短时间里体重掉了12斤。

比起药物对身体的折磨,更难忍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有问题,没问题? 有问题,没问题?”拿到检测结果前的每一天,冯秀岭都不停猜测着答案。由此,他也想过不再做这么危险的手术。可面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冯秀岭发现自己无法停止脚步。即使在服用阻断药期间,他还为两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冯秀岭最终躲过一劫。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又经历了3次职业暴露,但他反而不再像最初那样担忧和恐慌。“只要站上手术台,暴露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如全身心地专注于手术本身。”

现在,针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和风险防范,河南省传染病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流程。在普外科,每月100例传染病患者的手术中,艾滋病患者占到40%。几乎每一名医护人员都遇到过职业暴露,但没有出现任何感染案例。

“不给看”与“看不了”的困境

在各地传染病医院,因为明确了解治疗对象的特殊性,从而能对医护人员进行有效防护。但在普通综合性医院,由于有的患者刻意隐瞒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反而可能使医生置身危险之中。冯秀岭说,在他的病人中,就有两位因工作感染艾滋病毒的医生。

2012年,天津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肺癌患者因求医屡次遭拒,选择私自更改病历隐瞒病情,并最终接受了手术。此事引起了多方讨论和关注,在谴责这位患者为医护人员带来风险的同时,艾滋病人“看病难”的心酸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同情。

“这更多是医疗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冯秀岭告诉记者,普通综合性医院不同于专业传染病医院,院内感染控制的专业性和严格性都要稍差一些。“医院不仅要考虑医护人员可能遭遇的职业暴露,还要考虑普通病人的安全。”在冯秀岭看来,让艾滋病人转到专科医院治疗,是一种正确的引导。

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125万存活的艾滋病人,他们的就医场所大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定点医院或省会城市的传染病医院,但并非所有医院都开设有完善的外科科室。以地坛医院为例,因为没有胸外科,就无法为上述肺癌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为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服务的医生。

最近几年,冯秀岭一直希望为科室引进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但自2018年公开招聘以来,应聘者寥寥无几,好不容易有两名专业对口的研究生,一个来了3天就离开了,另外一个也没坚持到一个月。

“这是一份高危职业,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也能理解。”普外科护士长张元蓓告诉记者,刚毕业时,每天来上班她也心惊胆战。可随着时间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中往前推移,“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这里跟别的医院有什么不同。”

其实包括冯秀岭在内,许多医护人员的家人都出于健康的考虑,屡屡建议他们换科室换岗位。“可总要人做这些事,要承担这些风险。”冯秀岭说,往后,他希望让更多的年轻医生正确认识艾滋病,让艾滋病群体得到与普通人无异的医疗救治和帮助。

(原载于《工人日报》2019年7月13日4版)